

Title	中国文字改革的論争與傳統派觀點的"反潮"
Sub Title	Chinese language reformation and the recent rise of conservative views
Author	山下, 輝彦(Yamashita, Teruhiko)
Publisher	慶應義塾大学藝文学会
Publication year	2009
Jtitle	藝文研究 (The geibun-kenkyu : journal of arts and letters). Vol.96, (2009. 6) ,p.133(144)- 149(128)
JaLC DOI	
Abstract	
Notes	
Genre	Journal Article
URL	<a href="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072643-00960001-0149">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N00072643-00960001-0149</a>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KOARA)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コンテンツの著作権は、それぞれの著作者、学会または出版社/発行者に帰属し、その権利は著作権法によっ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す。引用にあたっては、著作権法を遵守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The copyrights of content available on the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rces (KOARA) belong to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cademic societies, or publishers/issuers, and these rights are protected by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When quoting the content, please follow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 中国文字改革的论争与 传统派观点的“反潮”

山下 輝彦

中国文字改革的起始如果从清末的卢懋章算起，已经有了100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几种社会制度的更迭，换了好几个朝代。对于中国的文字改革，主张废除汉字、实现拼音化的改革派与捍卫汉字、不允许废除汉字的传统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语言文字是有关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为政者曾经一直在努力调和两派的矛盾，为此作出决策，并付诸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行政上对这两派的论争下了一个结论，但是两者之间的论争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本文试以文字改革的两派论争为线索，探讨两者论争的焦点，并对以这个论争为背景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作一点考察。

鸦片战争唤醒了沉睡东方的狮子，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一直以“天朝”自居的中国第一次败在列强手中。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文明更强大的国家。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中国之所以被外国欺负，就是因为中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下，教育不普及，科学技术不进步。要想提高教育水平，必须要越过汉字这一关。跟西方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字数多，形体复杂，不是简单地可以掌握的。中国贫穷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汉字这一难以掌握的文字。只要汉字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也会像西方一样强盛起来。这些看法在当时似乎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

可以说，中国的文字改革是由汉字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中国社会落后这一观点开始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创立了使用罗马字的汉语拼音法，这些拼音文字很多被称为教会罗马字。到了清末，中国人本身受到这

些罗马字的影响，开始创造自己的拼音文字。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是卢戇章。他设计了一套类似日本假名的汉字笔划式字母，称作“中国切音新字”，开了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先河<sup>1</sup>。当时创造这些新字的人都认为汉字难学、难记，以致中国大部分人都是文盲。要想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必须要学习西方，使用拼音文字。就当时这些人的主张来看，只是想给一般民众设计一种容易学习的文字，走富国强兵之路，而并非是要废除汉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能够使用汉字是他们的特权，汉字是身体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是文化的载体，废除汉字就等于废除中国文化。因此，卢戇章等人的文字改革只是想让人们通过“切音新字”进行交流，并将其作为学习汉字的工具。由于这种文字改革，并没有想把汉字改为拼音，因此没有受到太多人的反对。

辛亥革命以后，不少知识分子认为汉字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严重，因此提出了一定要废除汉字的要求。他们认为封建统治阶级依靠汉字统治人民几千年，不废除汉字，民众就不能翻身。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恨之入骨的鲁迅对汉字的发言尤为激烈。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指出，在中国能够识字的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二。能用这种文字写文章的人当然还要少。他说中国等于没有文字。认为中国人要生存下去“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sup>2</sup>

国民政府对文字改革采取的是比较消极的态度。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让卢戇章、王照等创造拼音文字的清末知识分子参加。会后审定了六千五百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并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sup>3</sup>因政府怕招来保守派的反对，把注音字母的使用只限定在给汉字注音的范围内。这一点从名称上也看得出来。后来干脆把名称改为“注音符号”，更加一目了然。

继注音字母之后，1926年9月政府又制定了“国语罗马字”（以下简称“国罗”）。这是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等五人组成的“数人会”成员等人经过多次商议而制定的。也因为政府的态度消极，公布使用竟拖到1928年。<sup>4</sup>虽然“国罗”没有普及，但是由政府公认的汉语罗马字拼写

法是由此开始的，其意义可谓相当深远。

用罗马字作为汉语拼音，在“国罗”之外，还出现了另一套文字拼写法，那就是以留学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等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的中文拉丁化方案。这一派和上述的“国罗”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sup>5</sup>首先两者的制定原则与目的截然不同。“国罗”被称作注音符号第二式，就是说不将其作为文字来看待。而拉丁化方案则认此为新文字方案。另外一点不同的是，经过讨论，“国罗”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坚持全国语音的统一。而拉丁化方案则强调中国现在还是方言共存的发展阶段，为便于广大民众的使用，先要把方言拉丁化。其中有北方话、江南话、广东话、闽南话等多地方言的拉丁化方案，尤以北方拉丁化方案最为重要。我们一般知道的也就是这个方案，简称为“北拉”。两者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体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立场。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也一直使用“国罗”，而大陆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拼音方案基本上是“北拉”的路子。鲁迅是属于“北拉”一派的，他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中略）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字本为大多数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sup>6</sup>鲁迅的话中涉及了“国罗”派抨击“北拉”的事实，表示捍卫“北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制定汉语拼音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国民政府时代，拼写汉语有两种文字：注音字母和“国罗”。前者是民族形式，后者是国际形式。共和国的拼音文字应该采用哪一种，也曾经有两派。毛泽东开始主张民族形式，后来同意使用拉丁字母。周有光曾经撰文介绍这段历史：“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曾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尝试制定民族形式的方案。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拿出四种民族形式的方案草稿给会议代表们征求意见。代表们的答复是有礼

貌的沉默。后来，在1958年终于放弃民族形式，采用拉丁字母。为什么呢？首先，什么叫做民族形式？创造一套汉字形式的字母，并不难。可是，我有我的创造，你有你的创造，可能性是无穷的。各自都以为自己的创造最好。要互相同意，很难。要开会通过，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一千几百种方案，各具匠心。”<sup>7</sup>周有光在其他文章中也强调了制定民族文字的困难。指出“创造一套字母不难，同意一套字母极难”。<sup>8</sup>周有光提到的四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据说其发明者是：吴玉章、丁西林、黎锦熙、陆志韦和郑林曦。<sup>9</sup>这些人都是当时文字改革的大家，难怪代表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只能以“有礼貌的沉默”来答复。

当时很多人都支持拉丁化文字。认为采用拉丁文字正好符合人们对中国新文字的要求：1、科学化 2、国际化 3、大众化。罗马字是音素文字，拼法比较科学。许多国家使用拉丁文字，所以对这种文字并不陌生，可以说比较国际化。从教学“北拉”的经验来看，一般大众也比较容易学习拉丁化的文字。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反对汉字拼音化，认为推行拉丁化文字会断送汉字文化传统。但中国政府并不认为在短期间内会完全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周恩来曾多次说明汉语拼音还不能代替汉字。他在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说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了安慰那些提倡使用民族文字而反对使用拉丁字母的人，他还说：“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更不是任何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像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从来源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来为我们服务一样……因此，这是不会使我们的爱国感情受到任何损害的。”对于人们所关心的汉字前途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

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sup>10</sup>

周恩来的这段话乍一听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仔细推敲起来却也有点牵强附会。把语言文字与火车、轮船等工具的应用相等同，稍微有点语言学知识的人恐怕都不能苟同。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工具，在发明、设计和制造过程中虽然含有许多文化的要素在里面，但是使用起来，却不会因文化不同而有障碍。表达语言的文字虽然也属于工具类，文字里面也包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但不是简单地可以由不同文化的人来利用的。周恩来的话隐约反映了当时反对拼音化的人数之多，为了缓和矛盾，减少反对派的阻力，他婉转说明了采用拼音的好处。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多次表示汉语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为此，表面上敢反对的人比较少，背地里反对的人比较多。当时如果从正面角度反对，就等于“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公然反对文字改革”。实际上反对者中，很多人是爱国的，是善意的反对。周恩来的这些发言采取了融合的态度，也没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周有光在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名称时说，删除“拼音文字方案”的“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并且说周恩来的报告中所讲的话是“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无谓的争论”。<sup>11</sup>

在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互相争执中，政府虽然采取平衡政策、慎重施行文字改革，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宣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字方案”（以下略称“二简”）却以失败告终。“二简”于1977年12月20日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报纸上发表，《人民日报》从12月21日开始试用“二简”草案第一表的248个简化字。1979年1月停止试用，1986年决定废止。对于废止前后的详细情况，官方没有发表任何信息。

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字改革公开进行批判的现象有所增加。中国以每年百分之10以上的增长率发展经济，2008年9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在某些方面已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因汉字的存在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这就给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很多发言权。其中心人物有两位：一位是香港巨富安子介，一位是从美国归国的华人袁晓园。夏威夷

大学教授、著名美籍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在美国第48届亚洲学会（夏威夷，1996）分组会上的发言中，称以安子介为首的对文字改革持反对意见、主张汉字优秀论的为“传统派”，称始终贯彻执行中国文字改革政策的为“改革派”。<sup>12</sup>为叙述方便，笔者在本文中也借用这一称呼。

安子介是香港的实业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参加过香港回归中国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香港回归中国时是政界霍霍有名的人物。他一直从事商业工作，到晚年才开始研究汉字。李敏生、李涛在所著的《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sup>13</sup>（以下简称《昭雪》）一书中对他的汉语研究作了详细的介绍。《昭雪》认为“语言文字是民族的重要属性和特色，汉字被众多的炎黄子孙称颂为‘中国魂’，汉字是最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瑰宝。今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汉字学的复兴与语文界的‘东亚病夫论’的种种陈词滥调的破灭都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安子介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产物。他坚定不移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的正确道路、复兴和发展了汉字学的中国特色、并融汉字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于一体，使他的汉字学说以全面的、崭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态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汉字学已经进入到汉字科学的发展的新阶段。”<sup>14</sup>《昭雪》对安子介作了如此高的评价，安子介的研究果真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吗？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科学分析”。在安子介、郭可敬著《汉字科学的新发展》一书<sup>15</sup>“声旁的真谛”一节里，作者主张以“声旁”为主体，去解释一个汉字的原意和衍伸义，即把同一声旁跟另外一个部首拼合起来成为新字，可以看出那个声旁实际上是一条无形的线。他以“壬”这个声旁为例，说这个声旁虽有很多意思，但可把它解释为“不管怎样、你得接受、来了才知”，以此为引线，则下面的13个字都可以得到通顺的解释。

“任”字意思是：“不管怎样”，由“人”去安排。

“妊（妊）”字意思是：“不管怎样”（无法先知是男是女，或者是怪胎），“女”人有孕了。

“饣（饣）”字意思是：“不管怎样”（是咸是甜，或者淡而无味）是可以“食”的（古人没有现代人那样自由选择）。

“衤（衤）”字意思是：“不管怎样”（舒服或不舒服，你得和“衣”而睡）。

“荏”字意思是：“不管怎样”像“草”一样，枯枯生生，总是过去（和“时间”没有两样）。

“赁”字意思是：“不管怎样”，人家给了你“贝”（即“钱”），你就得“任”人家，爱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

“凭”字意思是：靠在“几”上，“任”你斜身，不会下跌。

“嫖”字意思是：对女人“任”意施“爪”。

“淫”字意思是：像“水”、“爪”一样，任（“壬”代）意地施暴。

“霖”字意思是：上面下来的“雨”，任意施暴（淫）。

从这个例子所做的声旁分析中，似乎很难看出其中有“科学”的含量。以往的文字分析，都把“壬”字作为声旁，由“壬”字组成的每个字的意思都是由另外的“义旁”来表示的。安子介作出这样别出心裁的解释，令人颇为费解。

《昭雪》的作者在该书中介绍了许多安子介的“名言”，比如“汉字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汉字是中国另一大发明，其意义和价值不在自然科学内四大发明之下。”1987年2月，安子介在香港《大公报》和《明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的主张。这一主张成了反对文字改革、提倡保留汉字的传统派的一个口号。以前他们反对文字改革只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有这样一个人物出来替他们讲话，他们当然可以站出来大声疾呼了。

传统派还有一位代表人物，名袁晓园。对于袁晓园如何走上研究汉字的道路，本人有过一番自我介绍：“晓园原是美籍华人，被汉字萦绕数十年。由认为汉字尽善尽美，转到只有拉丁字母才能救中国。因此，在美国大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因抗美援朝，中美交恶，被人发现本人所推行的方案是中共所制定的，将我解聘。后来，我考进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每天同汉字和英法俄西班牙等文字打交道，也接触了许多其他语文，这才逐渐发现了汉字的优点。在五种同一项目的卷宗里，中文本永远是最薄的，证明简短明确是汉字的最大优点。”<sup>16</sup>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本来主张使用拼音的人后来成了反对文字改革、宣扬汉字优秀的领袖。袁晓园所提到的汉语优点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比较，只从文字的容量上来比较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如此，袁晓



园还是成了传统派的中心人物。她于1980年3月成立了“汉字现代化研究会”，担任会长，后来有安子介参加，任名誉会长。1989年创办《汉字文化》杂志，第1-2期合刊上登载了该研究会于88年10月举行“汉字研究座谈会”的发言记录。<sup>17</sup>登载发言人数达44人之多，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史有为、朱德熙、张志公，国家语言计划方面的负责人陈章太、高景成，另外还有后来因诉讼关系与该杂志副总编成为仇敌的著名学者伍铁平。国家语言计划方面负责人的发言是属于改革派的，著名学者们的发言大都不明确说出自己是哪一派，只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评价汉字。属于汉字研究会的人士则大力宣传汉字的优越性。袁晓园积极主张的是“识繁写简书同文”。她认为现在海峡两岸的文字不同，大陆人已经不认得繁体字。让大陆的人除了可以读写简体字以外，还能认识繁体字，这样可以促进中台的统一。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与会者很多人的赞同，著名科学家、该会的名誉会长钱伟长就在发言中表示赞赏。钱说：“我国十亿人口共有一份‘书同文’的汉字遗产、历两千年而生命不息、在世界上哪个民族能和我们相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对于两种对立的态度作了中肯的告诫，在题目为“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的文章中说：“认为汉字不能拼音化的同志千方百计给汉字评功摆好，甚至把缺点也说成优点。主张汉字拼音化的同志则只看到汉字的缺点，甚至连汉字真正的优点也不愿承认。只有克服了这两方面的偏向，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走上轨道。”<sup>18</sup>但是他的发言并没有起到作用，《汉字文化》批判文字改革的言词越来越激烈，宣扬汉字的优越性、强调中国文化之优秀的语言表达越来越升级。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题为“汉字落后论时代结束二十一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座谈会”。《汉字文化》登载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这些发言中有的措辞相当激烈。例如柳斌在给座谈会的贺信中写到“辱骂祖宗，有背人道……有些人骂祖宗，骂祖国，骂民族文化传统，以此博得主子的欢心，实在有背于中国人的为人之道。……袁先生举行弘扬文化传统的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我十分佩服袁先生的爱国之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提倡汉语拼音化就是以侮辱中国文化来博得“主子”即外国人的欢心，就是违背人道。这是如何激烈的语言！

在座谈会上钱伟长的讲话题目是“振兴中华，汉字大有可为”，其副标题

是“汉语拉丁化不符合中国国情”<sup>19</sup>，完全否定了进行了几十年的文字改革。钱伟长认为推行普通话是很好的，但是即使统一了普通话以后也不能实现拼音化，因为汉语是单音节的，同音词无法用拼音来区分。认为汉字难学，难学就要拼音化，这是“崇洋媚外”。这对于积极从事文字改革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项“帽子”。

钱伟长强调说汉字是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认为如果中国没有汉字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字，中国现在可能会分裂成三十几个国家。他还说，“现在外国人有很多是好的愿望，但中间也有某些人则企图用文字来搞分裂。有这么一批人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给少数民族搞拼音文字，企图把他们分裂出去。因为文字一不在一起，就很容易分裂出去。时间长一点就出事。”<sup>20</sup>他把文字改革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里涉及到了搞民族分裂的问题。传统派中很多人都特别强调汉字在统一中国中所起的作用，强调汉字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优秀文字。认为少数民族也应该使用汉字，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的交流和团结。这种想法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别，从发音上看，似乎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但因有了汉字，虽然同一汉字各地方言发音不同，也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这一点确实是事实。但是对于少数民族，一般的做法是为他们的语言创制拼音文字，如果让他们使用汉字，那就等于强迫他们汉化，这是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相违背的。钱伟长是中国知名的物理学家，作为汉字科学研究的权威被聘请为“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但是语言与文字问题毕竟不是钱伟长的专业，因此他的发言有些是违背语言文字学常识的。例如他在强调汉字的优越性时最后竟提出，将来世界上通用的文字可能是中国文字。他认为，使用汉字解决了各地方言发音不同所造成的交流障碍。操方言的人在讲不通的时候只要一写汉字就能够互相沟通。世界各国语言不同，但是如果把汉字当作交流的工具就可以互相沟通。他说：“世界上现在能够通用的东西不多。只有几个东西是通用的。象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这个全世界通用的。发音不一样，比如北京人和宁波人发音就不一样，不过一写出来就都认识了。另外，数学方程式和数学符号全世界是统一的，所以数学的国际年会最容易开。你随便讲什么话，只要一写出来数学方程式，大家就都能明白。（中略）将来

语言的统一应该大家都能接受的，不改变母语。（中略）所以我们的文字是带点音可也不带音，是看图识字得出来的。这有它的优点，现在这个优点逐步有人开始受到重视。我们宣传不多，我们总觉得自己不足，因为我们吃了150年帝国主义的亏，人家的炮比我们的大，飞机比我们厉害，我们好象不行。其实不是，从文化上讲的话，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宣传，不要对外国人怕，没什么可怕的。他如果不认识我们的字，教他一，二，三，他就认识了。教他一个‘人’字，‘人’有两条腿，可以把这样一点点评，慢慢学，会觉得不难。”<sup>21</sup>

钱伟长的发言可以说是反对文字改革的传统派里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派认为中国文盲多的原因是因为汉字难学，而他的这一发言就是强调汉字如何优秀、如何容易学。最近中国语文界和教育界，举类似这样极端的例子来主张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的大有人在，但是都不太具有说服力。

传统派在拥护汉字、反对改革方面的活动是成立团体和发行杂志，与改革派发起论战。担任传统派名誉会长等职务的都是社会地位相当高的人物或是与高层人物有密切关系的人。比如钱伟长是第四届人大代表，担任政协副主席等要职，被称作钱老。鉴此因素，中国国内的改革派中公开指名道姓对安子介、袁晓园、钱伟长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的文章比较少见，即使有，语言也都非常委婉，客气。他们把批判传统派的矛头主要指向《汉字文化》副总编辑徐德江。

徐德江出生于齐齐哈尔，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曾当过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的语文教师。后来认识袁晓园，成为传统派的主力。他与袁晓园联名发表多篇文章，赞扬汉字的优越性，反对文字改革。但是，他的文章及《汉字文化》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以安子介和袁晓园的主张为中心，对安子介与袁晓园的话反复说明和举证。《汉字文化》等传统派的主张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在强调汉字是优秀文字的同时，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是与众不同的语言，不能用西方语言文字理论来分析汉语，看待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总的倾向是否定语言学的基本常识——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认为汉字是直接表示人们概念的文字，可以不考虑发音，而且他们还常常把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

由于徐德江以语言学家自居，竭力批判现代语言学理论，受到中国国内语言学界许多学者的批判。很早就对徐德江提出严厉批判的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伍铁平。伍铁平在《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发表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中把徐德江称为“学术骗子”。1995年11月18日徐德江以伍铁平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为由把伍告上法庭。法院于1996年2月受理这一案件，经过两次审理后，于1998年7月签发公函明确指出：“此案法院不宜审理”，就是说法院对于学术上的论争不参与。虽然在这场官司中伍铁平胜诉，但是他所受到的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为争取法院作出不审理的结论，学者们曾纷纷签名支持伍铁平，最后语言学界共有708人<sup>22</sup>签名，轰动一时，险些发展为一场政治斗争。在官司结束后，伍铁平开始反击，首先通过调查，了解到徐德江在复旦大学客座教授职位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查手续，于是奋起揭发，徐丢掉了这个头衔。伍铁平把徐德江的一系列言论等判断为“伪科学”，兴起了一场驳斥“伪科学”的大批判运动。

传统派与改革派除了对汉字的认识在理论上不同之外，两派在小学的语文教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传统派主张小学除了教简体字以外，还应该教繁体字。对社会上的用字也主张“书同文”。所谓书同文，如上文所述，就是与台湾、香港之间能够达到文字上的统一。袁晓园作为代表，提出了“繁简并用”的主张。她把自己的建议总结为以下6条：1. 要取消废除繁体字的规定，宣布繁体字也是合法的正式文字，允许出版物包括报章杂志逐渐使用繁体字印刷。2. 规定政府通过的简体字为汉字手写体的正字仍然合法，但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学认繁体字……。3. 准许使用各种有效方法为汉字注音，包括用汉字为汉字注音。4. 严格对待法定汉字，报刊、书籍、广告、电影、电视中，不得用拉丁化拼音来代替汉字与汉字并用。5. 在语言文字科学研究中，要坚持百家争鸣，坚持改革开放，扩大讨论园地。6. 建议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学校教学大陆的简体字。<sup>23</sup>

袁晓园的这一建议，在《汉字文化》杂志上被称作“识繁写简”，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各篇文章中。在简体字已被广泛应用、完全恢复繁体字已经不可能的现状下，这一折衷的想法被认为可行，受到传统派和同情传统派的人们

的支持。其实仔细分析这6条建议，可见不少矛盾之处。比如，宣布繁体字也是正式文字就等于恢复繁体字的正统地位。如果把简体字定为手写体，现在的汉字使用者还可以分辨，但是将来作为正式印刷体只看到过繁体字的人则无法学会规范的简体字。这样繁体字就会逐渐取代简体字。建议中要求允许用汉字给汉字注音，这就是想尽量废除使用拼音罗马字。这样又恢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直音即“读若”“读如”“音某”或反切的标音方式，使时代倒退上百年。建议中提出不得用拼音来代替汉字，这是针对改革派推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允许学生在汉字中夹用拼音的实验表示反对而提出来的。建议还提出要允许百家争鸣，这是为了表明传统派的言论属于学术研究，不是反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不应用行政手段予以禁止。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改革派的主张。改革派主要强调的是要维护多年来获得的文字改革的成果，防止“反潮”，根据社会状况继续探讨文字改革的可能性。改革派一方面与传统派在理论上展开辩论，进行如何完善汉语拼音的尝试，研究如何使其作为文字能够使用，另一方面则把积极推进“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作为实际工作来做。因为文字改革派认为，文字是书写语言的符号，一个人所记忆的词汇如果不能用文字书写会影响他的文章表达能力，妨碍思维。小学学习汉字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记忆词汇的速度，因此没有学过的汉字词汇如果能用拼音来书写，就不会影响小学生智力和思维的发育。入小学后首先学习拼音，然后通过拼音逐渐增加汉字的学习量。

传统派在这一点上也与改革派针锋相对。传统派强调应该按照传统的作法，先让学生在短期内尽量多学习汉字，然后阅读文章。因此，对于小学的汉字教学，现在有很多人想出种种方法，要让学生在低学年学完小学毕业所要学完的汉字。甚至有人提出在幼儿园阶段就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等方法学会几千字。在现在中国的社会上，这种做法正好与家长望子成龙的愿望相符合，因此颇有市场。由于传统派宣传在幼儿期学习汉字，头脑的发育会比较好，因此一部分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但是，这些说法似乎都没什么科学根据。

从改革派和传统派双方的阵容来看，改革派几乎都是多年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和吕叔湘、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周有光等著名学者都是改革派的代表人士。生前一直与传统派展开辩论的改革派领导人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文字改革》和《语文杂志》主编，曾任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均。属于中年学者的冯志伟是中国数理语言学的权威，在语言与文字的研究方面引进数理统计的手法，并进行了语言的电脑处理等科学研究，成为改革派的理论家。王力等老一代人，从小接受旧式教育，对汉字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是从理智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汉字太复杂，作为文字系统有太多的缺点。不像传统派所说的那样容易学，甚至可以成为世界文字。改革派的年轻一代则站在社会语言学的立场上，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也应该相应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最近提出的“一语双文”（汉语这一种语言使用汉字与拼音两种文字），不强调现在就彻底废除汉字，作为过渡期让人们逐渐熟悉拼音文字，根据用途的不同选择使用汉字或拼音文字。这种作法与日语既使用汉字也使用假名的正书法很类似。

而传统派中虽有一些学者专家，但都不是以语言文字研究为专业的。也许他们认为汉字是每个中国人书写自己的语言时所使用的符号，受过一般教育的人都掌握几千汉字，会写会读。因此谈论汉字问题，自己完全有发言的资格。但是他们不知道语言与文字问题属于科学范畴，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才能通过研究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只凭自己使用文字的感性认识来考虑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评价语言政策是否正确是欠妥的。有的人也许在自己的所属单位拥有很高的地位，也许担任政府的高官或有高官作后台，因此他们的言论总不乏发表的机会。《汉字文化》杂志是一本民间出版社的刊物，创刊时竟然有霍霍有名的语言文学界的大家们参加，其原因就在于背后有香港巨商安子介当名誉会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当顾问。据说，当语言学家伍铁平因批判《汉字文化》副总编徐德江的错误言论而被徐告上法庭时，竟没有得到自己学校领导的支持。<sup>24</sup>

回顾文字改革的历史，可以知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支持下，改革派的方案基本上都顺利通过（至少内部的不一致没有显露出来）。只要说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切都会通行无阻。因此，推广普通话，普及简化字，制定并通过了汉语拼

音方案等，使文字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停了下来。文革结束后不久，1978年12月20日政府突然发表了一二次简化方案，继而又于1986年6月24日，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的《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这就表明了两派的斗争反映在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十分激烈，以致于政府会朝令暮改。这一时期，中国全社会处于“反思”时期，政府高层也有许多人对文字改革提出疑问，反对派与支持派斗争十分激烈。政府当局采取折衷手法，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将《文字改革》杂志改为《语文建设》杂志；将“文字改革出版社”改为“语文出版社”。<sup>25</sup>

对于文字改革派来说，可以说是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两派经过激烈斗争，得出了折衷的结果，即2001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律中第二条说“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十八条阐述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sup>26</sup>但是，“文字法”的颁布并没有阻止住两派的激烈论争。改革派认为这并不禁止学者研究如何使拼音完善，以发展成为文字的活动。传统派则呼吁应该把繁体字也作为正式文字来使用，他们称之为“书同文”。

语言文字改革上传统派观点的“反潮”现象与现在中国社会的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之所以能够积极推进简化字的普及，是由于中国处于闭关自守时期，与外国没有太多的交流，一般人接触繁体字的机会很少。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投资者与商品涌入大陆的同时也带来了繁体字。看港台电视节目，字幕都是繁体字。人们对繁体字已经不太陌生，“识繁写简”、“书同文”的口号因此而应运而生。

造成中国文字改革“反潮”、使文字改革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腾飞。经济的发展使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丧失的自信又恢复了。“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作为体现中国文化的汉字

当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这种论调是最鼓舞人心的，是最容易得到支持的。而且以前电脑不能处理汉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就让改革派的汉字妨碍现代化这一说法没有了立足之处。

与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言论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有了松动。只要不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许多言论是不被禁止的，更何况传统派的说法得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近年来社会出现一种复古倾向，建立一个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区在内的大中华世界的思潮在社会上抬头。传统派提出的所谓“书同文”就是明显的一例。“书同文”是要在港、台、中之间实现文字上的统一。语言文字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从简体字改为繁体字，后来又改为简体字的几次反复，都与中国的台湾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反映出了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中两派斗争的强弱之比。

中国的文字改革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进行了50年。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可以说是以往几十年都未曾有过的。社会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等等都对文字改革带来了影响。这绝不是单纯地从学术上和理论上能够解决的问题。两派的论争今后还将继续。本文首先回顾历史，考察了文字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同看法。其次，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字改革，以传统派的观点为中心，粗浅地介绍并考察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论争。因为身在日本，许多重要的资料不易获得，分析也不够透彻。衷心希望学者前辈赐正。

#### 注

- 1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p.43-45 何九盈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2 「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 六》P.89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 北京
- 3 《周有光语文论集 第一卷》p.39 周有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年1月
- 4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p.53
- 5 《危机下的中文》p.152 潘文国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 6 「关于新文字——答问」《鲁迅全集 六》p.126-127
- 7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p.75-76 周有光 著 语文出版社 2006年11月（录自《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1995年版）



- 8 「汉语拼音三原则」《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p.80 (原载香港《语文杂志》1982年7月第9期)
- 9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p.97 (原载《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
- 10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p.79, 81 陈乃华 许长安 宋柏尧 撰稿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5月
- 11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p.98-99
- 12 《中国辞书事业在十字路口》美国夏威夷大学 德范克 (John DeFrancis) 载于《语文与信息》(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双月刊 (第6期 1996年11月 INTERNET ISSUE 6 November 15, 1996)
- 13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李敏生 李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7月
- 14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p.3
- 15 《汉字科学的新发展》安子介 郭可敬 著 香港瑞福有限公司 1992年《汉字新论》刘庆俄 编 同心出版社 2006年3月 转载 p.35-36)
- 16 《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上》袁晓园 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年8月
- 17 《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 p.2-p.37 汉字文化杂志编辑部 主编 袁晓园 副主编 徐德江
- 18 《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 p.13
- 19 《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 p.15- 汉字文化杂志编辑部 主编 袁晓园 副主编 徐德江
- 20 《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 p.16
- 21 《汉字文化》1991年第3期 p.16- 汉字文化杂志编辑部 主编 袁晓园 副主编 徐德江
- 22 The Annotation of “Pseudo-scienc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Circl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rch (2001. No.6) written by Doc. David Moser Michigan University (本文资料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网”2006.10.7 李京廉 译文 <http://www.yywzw.com/new05-06m.htm>)
- 23 《团结报》1988年4月26日 摘自《汉字新论》p.676-677 刘庆俄 编 2006年3月
- 24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伍铁平 (2005年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上的发言)说:“我的案例的另一深刻教训是,我国某些部门的官本位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发扬正气,打击邪气。在我被学术骗子诬告期间,某个掌握语言文字学界大权的高官由于在《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第9页上曾公开发文,完全不符合事实地说“我对袁晓园、徐德江先生从事科学实验,始终抱着一种由衷的敬意”,因此,官司

- 一起，他竟压制对徐德江的批判，将我批驳徐德江的所有文章，包括下面将提到的柳斌同志作了批示的文章通通退掉，致使法院受此影响，长期不敢判案。”资料来源：<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54769>
- 25 《汉字现代化研究》p.153-154 王开杨 著 齐鲁书社 2004年8月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七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0年10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2000年10月31日”（人民网 people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80/22080/1898075.html>）